

中国人民大学
丛书

社会指标 理论研究

郑杭生 李强 李路路著

社会指标理论研究

郑杭生 李强 李路路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会指标理论研究

郑杭生 李 强 李路路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北京华生印刷厂排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 9.875 插页6

1989年9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2次印刷

字数: 215 000 册数: 1 001-4 000

ISBN 7-300-00596-9

C·39 定价: 4.70元

0709/32

《中国人民大学丛书》

总 序

我们祖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振兴时期，正沿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向前迈进。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推动着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实践上的开拓创新需要在理论上给予科学的总结、论证和指导。

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于1950年，她是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的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广大教学和研究人员，决心遵循“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撰写出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科学论著，作为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的骨干工程，以推动学校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适应为国家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需要，更好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中的重要作用。这就是编写出版《中国人民大学丛书》的宗旨。

中国人民大学丛书要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吸收当代

人类文明的新成果，针对新的实际，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研究各学科的基本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力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和行政管理学科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上作出新的贡献。收入丛书的著作，将注意基础学科的新研究以及在发展应用学科，开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等方面的新著述。

中国人民大学丛书要求有好的文风，力求对所探讨的课题的历史和现状有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根据丰富的事实和资料作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论证。

编写中国人民大学丛书是一项艰巨的科学工作。要切实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作者大胆探索和创造，提倡自由的学术讨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让我们把马克思这句至理名言当作座右铭，响应新时代的召唤，谱写科学研究的新篇章。

《中国人民大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1986年7月

前 言

社会指标及其体系的理论研究，可以看作是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的一个方面。

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测量、社会预测的手段，社会指标及社会指标体系在6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人们重视，70年代国际上掀起了一个人们称之为“社会指标运动”的研究高潮。在我国，近年来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用指标及其体系来测量、评估多方面的社会状况，来预测、计划今后的社会发展，也显得日益迫切了。目前国家统计局及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研究机构都在组织人力进行一系列的研究。社会指标的研究既可以偏重于应用的，也可以偏重于理论的。应用的研究应当占绝大多数，但理论的研究也不可以放弃，二者不能偏废。这本专著题名为《社会指标理论研究》，正是表明它属于后者。当然，偏重理论并不是意味着可以脱离实际、忽视应用。

我们深深知道，社会指标及其体系的研究是难度很大而又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的事。我们几个人在不长的时间内所能做的事情显然是极其有限的。同时，我国还缺少系统研究社会指标及其体系的著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为了有助于高校社会学的教学工作，我们认为，较系统的理论研究是必要的。因此，我们确定了下列重点：分析国

内外社会指标和社会指标体系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研究社会指标的分类和功能，探讨建立社会指标体系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第一、二、三章），并在上述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指标体系的基本构想（第五、六、八章）。此外，由于社会核算和主观社会指标体系的重要性日益明显，有必要以专章加以讨论（第四、七章）。如果我们所做的这一小部分工作，能给我指标体系研究的宏伟工程添一块砖加一块瓦，我们将感到非常荣幸。

我们之所以重视这个问题，既有一般的原因，又有特殊的原因。一般的原因是我们认识到社会指标研究与社会学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社会指标及其体系既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又是发展社会学的必要途径。特殊的原因是我们提出的关于社会学的一种新的观点——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不仅需要定性的说明和论证，而且也需要定量的描述和解释，很显然，社会指标及其体系的研究有助于做到这一点。

作为课题的负责人，我必须提到李强、李路路所给予的密切和有效的合作。我为有一批在为人和做学问两方面都很不错的助手和同事而感到欣慰，也为有这样的同事而组成的学术群体而觉得自豪。在这里，我要感谢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同时也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所、社会学系许多同志对这一课题所作的贡献。在这里，我还要感谢责任编辑夏建中同志卓有成效的工作。

最后，社会指标体系的研究是一个意见分歧、众说纷纭的领

域。我们的看法很不成熟，疏漏、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我们将认真听取不同意见，欢迎批评指正。

郑杭生

1988.3.30

目 录

前 言	I
第一章 社会指标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1
第一节 社会指标的思想来源	1
第二节 社会指标运动	10
第二章 社会指标的定义、特点、类型与功能	24
第一节 社会指标的定义与特点	24
第二节 社会指标的类型	32
第三节 社会指标的功能	40
第三章 社会指标及其体系的建立	49
第一节 社会指标的设计	49
第二节 社会指标数据的获得	61
第三节 社会指标体系的建立	70
第四章 社会核算	86
第一节 社会核算的涵义	87
第二节 两种不同社会单元的社会核算	95
第三节 人力资源核算	109
第五章 建立我国社会指标体系的基本设想	122
第一节 建立我国社会指标体系的基本出发点	123
第二节 建立我国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	139
第三节 我国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基本结构	148

第四节	世界各国发展目标与战略的转变	153
第五节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发展目标的演变	162
第六章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	171
第一节	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含义与指标类别	172
第二节	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指标系统	181
第三节	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指标系统	194
第四节	个性发展指标系统	211
第七章	主观社会指标体系的建立	224
第一节	主观社会指标研究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 重要功能	224
第二节	主观社会指标的测量	234
第三节	我国主观社会指标体系的建立	248
第四节	应用主观社会指标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263
第八章	分析与比较	269
第一节	对我国社会发展的指标分析	269
第二节	与其他社会指标体系的比较	297

第一章 社会指标研究的 起源与发展

虽然社会指标概念是直至本世纪60年代中期才正式提出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以前不存在社会指标和对社会指标的研究。实际上，试图对社会进行指标性测量的思想具有悠久的历史。社会指标思想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统计学或社会统计学的思想，二是社会学的思想。

第一节 社会指标的思想来源

一、社会统计学思想

世界文明的发展一直是与试图利用各种手段去获得新的信息这一努力紧密相联的，而统计就是获得信息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据记载，早在奴隶制时代的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当时的统治者就曾为了课税、征兵、分配土地等对人口、土地、财产等进行过统计、计数。公元前3050年，埃及在建造金字塔时，曾对全国的人口、财产进行了统计，这是目前见到的应用指标统计社会现象的最早记载。在我国，社会统计的实践也是古已有之，公元前2250年夏禹治水时曾统计过我国的人口，当时全国计有

13 553 923人，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人口统计指标的记载。不过，古代所进行的仅仅是一些实际的统计活动，还谈不上有什么社会统计或社会指标理论思想。一般认为，比较系统的社会统计理论是17世纪中叶，为适应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才产生的。统计学（Statistik）这个名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德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①统计学这个词在德文中的最初含义就是“关于国情、国势的研究”。当时的德意志境内封建割据严重，竟有300多个小邦，德国学者之所以提出“国情研究”其目的就是要收集有关整个德意志国家的人口、财政、商业、军事等方面的数据以了解和维护整个民族国家的利益。可见，即使仅从名称上看，统计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试图运用数据指标来研究社会的学问。

虽然统计学的名称是最先由德国学者提出来的，但是，真正最早系统阐述统计学理论的却是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配第写了《政治算术》一书，在书中他运用大量数据说明了英格兰、苏格兰的人口、土地、手工业、贸易、军事等社会状况，并与法国、荷兰的国情、国力作了对比。他应用了分组法，绘制了图表，计算了一系列的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这种用数字说话的方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配第在书中写道：“我进行这种工作所使用的方法，在目前还不是常见的。因为我不采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语进行思辨式的议论，相反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的问题，只进行诉诸人

① 不少人认为是德国的阿亨华尔（1719—1772）教授提出来的，也有人认为是他的老师马丁·施梅采尔（1679—1747）首先使用的，直到1770年统计学这个词才由德文译为英文。

们的感觉的议论，借以考察在自然中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①配第所说的正是社会统计以及社会指标思想的精髓，即它们要用事实和数据说话。

与配第同时代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约翰·格朗特，他本是伦敦的一名商人。格朗特于1662年发表了《对死亡率公报的自然观察和政治观察》一书，对伦敦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作了许多数量分析，将儿童与成年人、男人与女人、伦敦人与外省人的死亡率做了对比，并首次制做了不同年龄组人口的“估计寿命表”（The Table of Life Expectancy），说明了人们的寿命与多方面的自然及社会因素的关系。后来，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进一步完善了格朗特的“估计寿命表”。哈雷认为，这种表可用来为国情预测服务，例如预测一定数量的人口可能提供的士兵的人数等。

到了19世纪，这种对社会的政治、经济、人口等诸方面进行指标型研究、分析的活动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个时期一位颇为有名的人物就是比利时数学家、天文学家、统计学家阿道夫·凯特勒。凯特勒第一个把概率论引入到社会研究中来。他认为，人类从出生直至死亡的演变及人类的社会活动具有一定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只有通过大量统计指标的考察才能为人们所认识。他专门做了犯罪问题的统计研究，他认为，犯罪与两类因素有关。一是人口的自然属性：如年龄25岁为犯罪高峰、男性犯罪比女性高4倍、夏季多发生侵犯人身犯罪、冬天多财产型犯罪等。二是与政治、经济、道德等社会因素有关：如犯罪与财产状况有关、雇

① 威廉·配第：《政治算术》，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8页。

佣劳动者多发生财产型犯罪、自由职业者多发生侵犯人身犯罪等。他将犯罪事件按年龄、季节、气候、职业、教育等加以分类，得出一些常数，并以此预言日后犯罪行为的种类、数量等。对此，马克思曾赞扬说：“凯特勒先生在1829年发表的对可能出现的罪行的估计，不仅以惊人的准确性预算出了后来1830年在法国发生的犯罪行为的总数，而且预算出了罪行的种类”^①。凯特勒还提出了“平均人”的理论。他认为平均人代表一个社会的典型，是美的象征。他为平均人确定了具体的社会和生理指标，即这种人具有平均的身高、体重、智力、道德品质等等。只有符合平均人的条件才是真正的人。凯特勒博学多才，一生著述颇多，他先后写出了：《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或社会物理学的经验》、《统计学研究》、《道德统计》、《社会制度》、《社会物理学》、《人体测定学》等等。由于他对社会统计的重大贡献，人们常将他视为对现代社会进行定量分析的先驱。

19世纪中后期，对社会现象的统计、研究在德国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以恩格尔、克尼斯和梅尔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统计学派，他们都非常强调要通过统计数字说明社会现象。恩格尔认为，在社会统计调查中要对调查的目的、范围、时间、方法、组织等做严格的规定。他专门研究了衡量一个国家生活水平的指标和方法：他根据对英、法、德、比利时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调查提出了“恩格尔定律”。根据这个定律，一个国家生活水平的高低与该国人民食品上的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百分比成反比，换言之，人们的收入愈少，则饮食消费所占比重就愈大，收入愈高，则用于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79页。

食消费所占比重就愈小。克尼斯认为，统计学是社会生物学，借助于统计学可以使人们从数字资料中获得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认识。梅尔在其所著《社会生活中的群性》一书中指出，统计学应“以集团的定量观察为基础，对实际发生的事实以及根据这些事实所能演绎出来的人类社会生活定律，作有系统的说明和解析”^①。

20世纪以后，这种强调统计学应注重于运用指标分析和说明社会现象的思想在美国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有美国统计学家马约·史密斯、史特威·恰平等。史密斯在其所著《统计学和社会学》一书中指出：统计学是社会学的一个部门，它应运用大量观察的方法研究社会生活问题，应通过数量分析解释社会现象。恰平则写出了《实地调查与社会研究》、《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等著作，他对统计学的研究已经倾向于与社会学相结合了。

在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还有意大利人尼克佛罗，他在20世纪初出版了一本专门研究“生活测量”的书，几年后他又写出一书，名为《文明与发展之数量指标》。在书中，作者试图研究和提出社会文明各个方面发展状况的一些关键性指标，因此，它已近似于后来“社会指标运动”中的“社会报告”。

总之，社会统计学的发展表明，统计已经愈来愈从单纯地搜集事实与数据变成了试图寻找和提出具有“解释功能”的指标，因此，社会指标的提出正是上述趋势的进一步发展。

二、社会学的思想

在人们考察社会的过程中，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试图将社

① 转引自杨曾武等编：《统计学原理资料汇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试图获得有关社会整体的信息的倾向。这一倾向在社会学中和一些思想家的社会学思想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社会整体大于它的各个部分之和。因此，对社会的研究必须从它的有机体性、整体性出发，如果只对个别事物进行孤立研究，那就不能正确地认识社会状况。只有把握了整体才能认识各个组成部分。孔德的这一思想与后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社会系统思想无疑有密切联系。在探讨社会进步时，孔德认为社会进步是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如科学的进步、工业的完善、妇女的影响、艺术的繁荣、国家的进化、精神或理智的发展，以及人口、种族、气候等条件的变迁。当然，孔德并没有提出衡量社会进步的具体指标或标准。而且，他认为在所有上述因素中，精神或理智的进步最为重要，它是其他进步的基础，这反映了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社会学的另一位先驱斯宾塞也表述了类似的思想。他把社会理解为一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的各个部分执行着不同的功能，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社会有机体的结构越复杂，功能越分化，其各部分之间功能的联系和相互依赖的程度也就越高。他还进一步提出，社会的发展要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相适应，环境因素对社会发挥着影响与制约作用。由此可见，社会学从它刚一产生起就十分强调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的思想，它不是仅仅从某一个侧面认识社会，而是要综合社会多方面的信息，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发展、进步的脉搏。而这一点正是全部社会指标理论的指导思想。

然而，正式提出要对整个社会多方面的指数、指标进行综合

计算这一社会学思想的并且后来对社会指标理论有较大影响的却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庇古是福利经济学的创立者，他的学说就其渊源讲，最初是源于英国伦理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边沁认为追求快乐、避免痛苦是人的本性和行为的准则，而快乐与痛苦是可以用数学方法来计算的，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来以最小的痛苦求得最大的快乐。从整个社会看，可以通过计算来求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当然，边沁将社会看成是个人的总和，认为每个人都求得最大幸福或利益，加在一起就是社会的最大幸福或利益。1920年，庇古发表了《福利经济学》一书，他大大发展了边沁试图计算“最大幸福”的思想，但他不使用“幸福”概念，而是使用“福利”一词，他试图追求和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目标——社会福利，以缓和英国社会当时十分尖锐的阶级与社会矛盾。他认为，福利就是人们因占有财物及其他原因而产生的一种满足。福利的内容十分广泛，有些是难以计量的，他只研究那些能以货币计量的社会福利，或称经济福利。庇古企图寻找社会福利的最优程度或最优状态，这就使他不能不注意到“私人福利”与“社会福利”的巨大差别，即在某些情况下，私人福利的增加会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减少。他提出了“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概念。前者是指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投资者收入增加的值。后者是指从全社会看，追加耗用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要素所增加的产品或劳务的价值，不管这种收益为何人所获。庇古认为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常常发生背离。他举例说，酿酒厂酒的销售量的剧增会使酿酒商大发横财，但是，由于酗酒者的大量增加使社会治安费用大大增长、社会不安定因素增长，结果边际社会纯产值小于边际私人纯产值。